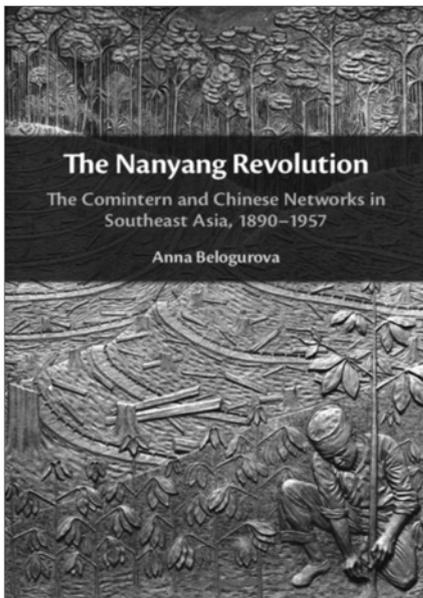


# 南洋共產革命之發軔

——評 Anna Belogurova, *The Nanyang Revolution: The Comintern and Chines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1890–1957*

● 梁加農



Anna Belogurova, *The Nanyang Revolution: The Comintern and Chines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1890–195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978年，強調發展優先於革命的鄧小平主導中國外交政策後，修正了之前毛澤東「輸出革命」的路線，減少乃至斷絕了對以當地華

人為主體的東南亞共產黨的援助。眾所周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950年代起，尤其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對緬甸、泰國、馬來亞共產黨等反政府武裝，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及其他方面的支援<sup>①</sup>。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一「革命」並不始於中國。東南亞南部的所謂「島嶼東南亞」，即中國傳統通稱的「南洋」(Nanyang)，也是蘇聯共產黨主導的共產國際(Comintern, 1919–1943)向東方輸出革命最早的目的地之一，與其向中國輸出革命幾乎同時甚至稍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與印度支那以外的南洋其他共產黨聯繫較少。1949年2月，毛澤東告知來華的斯大林代表、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Anastas I. Mikoyan)，「所有聯絡工作都是通過在香港的專門人員進行的，但是工作做得較差」。蘇共方面顯得對南洋的共產黨組織更加熟悉，米高揚提醒毛，「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暹羅和緬甸這些共產黨政治

中國傳統通稱的「南洋」，是蘇聯共產黨主導的共產國際向東方輸出革命最早的目的地之一，與其向中國輸出革命幾乎同時甚至稍早。對於南洋共產革命，蘇聯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南洋革命》主要對1920和30年代英屬馬來亞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中共產國際、馬來亞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英國殖民政府以及當地華人社區、會館的關係和互動進行分析，是一部系統考察南洋共產革命的史學專著。

局委員會中有許多美國和英國間諜，因此中國共產黨與他們交往時要小心謹慎」<sup>②</sup>。顯然，對於南洋共產革命，蘇聯在裏面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不過，學界一直未有基於前蘇聯的原始文獻的批判性研究問世。

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前蘇聯政府檔案一度開放，允許世界各國的學者到莫斯科去查閱。過去一直保密的原始檔案材料，刺激了國際學界對包括南洋地區的國際共運史開展新研究。2019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中國研究所研究員白安娜(Anna Belogurova)具有全球史視角的專書《南洋革命：1890至1957年共產國際和東南亞華人關係網》(*The Nanyang Revolution: The Comintern and Chines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1890-1957*)，以下簡稱《南洋革命》，引用只註頁碼)。白安娜出生、成長在前蘇聯境內的白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畢業，具有使用俄國史料的先天優勢；後留學台灣政治大學並獲得碩士學位，通曉中文；2012年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獲得博士學位。她的博士論文〈孫中山的榴槤：1926至1942年英屬馬來亞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共產主義〉(“A Durian for Sun Yatsen: Interwar Communism in British Malaya, 1926-1942”)，研究1920至40年代馬來亞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南洋革命》的初稿<sup>③</sup>。

《南洋革命》引用了俄國社會和政治史國家檔案館(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 RGASPI)解密的有關共產國際與南洋革命的檔案，包括許多第一次公開披露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結合中國發表的大批有關史料、英國外交和殖民部門的記錄、現藏於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與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Hoover Library & Archives)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卷宗，以及對相關人士的訪談(頁15)，主要對1920和30年代英屬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中共產國際、馬來亞共產黨(馬共)、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英國殖民政府以及當地華人社區、會館(特別是其中的左傾知識份子)的關係和互動進行分析，兼及周邊的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泰國(1938年前稱暹羅)、菲律賓等地的有關史事，是一部系統考察南洋共產革命的史學專著。

## 一 過往的相關研究

過去國際上比較有影響力的有關早期南洋共產革命的英文著作，多是華裔學者基於中文及英國、荷蘭殖民當局史料的研究，而缺乏更重要的前蘇聯方面的俄文原始資料，其中包括名家之作，諸如楊進發的《馬來亞共產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謝文慶的《蒙面的同志們：1945至1948年馬來亞共產主義統一戰線研究》(*The Masked Comrades: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 1945-48)、《馬來亞上空的紅星：1941至1946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和之後的抵抗和社會衝突》(*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46*)等專書<sup>④</sup>。此外，對1940至50年代馬共的有關歷史研究，還有漢拉恩(Gene Z. Hanrahan)的《馬來亞的共產主義鬥爭》(*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肖特(Anthony Short)的《追蹤山老鼠：馬來亞共產主義起義》(*In Pursuit of Mountain Rats: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等專書<sup>⑤</sup>。只是它們基本是成書於千禧年前，同樣欠缺一些最新的史料。至於中文文獻方面，又以可靠性較低的傳記和回憶錄為主，如曾長期擔任馬共總書記的陳平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My Side of History*)<sup>⑥</sup>。真正有價值的歷史研究都是建立在第一手原始檔案材料基礎之上的批判性研究，因此，白安娜運用解密的共產國際檔案展開對南洋共產革命的批判性研究，就頗為引人注目。

如所周知，南洋共產革命參加者的主體是當地華人。對於海外華人與共產革命的關係，過去的文獻主要聚焦於海外華人基於血脈、文化與中國大陸的聯繫，比較強調他們對祖國有天生的愛國情懷；而廖建裕(Leo Suryadinata)、王賡武、原不二夫、孔飛力(Philip A. Kuhn)等學者的研究則強調海外華人身份的混雜性和多元性<sup>⑦</sup>。但是投身南洋共產革命的當地華人於革命思想

上、組織上的源頭及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學術文獻中還顯得欠缺。尤其是這一群「革命新人」與傳統海外華人有所不同，他們承接着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以來推崇的人類思想行為的一種新風範<sup>⑧</sup>。

另外，伴隨着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近年人文、歷史學科中全球史研究興起。對於海外華人移民史的研究，也經歷了跨國轉向，促使學術界從傳統的主要關注各國家、各地區海外華人的研究取向，開始轉向更加關注人員、思想和商品的跨國界流動，強調各地之間的互動，將海外華人視為連接各國家、各地區和全球變化的一個線索，考察各地與全球性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出現了從人員、資本、技術和全球流通等角度重新詮釋中國與海外華人關係的新著作，例如麥肯歐(Adam McKeown)的《憂鬱的秩序：亞洲移民與邊界的全球化》(*Melancholy Order: Asian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orders*)、徐元音的《優質移民：黃禍如何成為模範少數民族》(*The Good Immigrants: How the Yellow Peril Became the Model Minority*)、陳珮珊的《離散祖國：全球大移民時代的現代中國》(*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sup>⑨</sup>。但具體到南洋華人與關係密切的遠方莫斯科共產國際之間跨國的、多維度的聯繫，以及其對南洋共產革命和當地社會的深遠影響，如何從全球史視角加以考察和敘述，無論在西方還是中文的學術文獻都還付之闕如。

具體到南洋華人與關係密切的遠方莫斯科共產國際之間跨國的、多維度的聯繫，以及其對南洋共產革命和當地社會的深遠影響，如何從全球史視角加以考察和敘述，無論在西方還是中文的學術文獻都還付之闕如。



白安娜將南洋革命置於近幾十年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海外華人史及全球史研究的學術脈絡中，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新探索。(資料圖片)

馬共的成立是由共產國際、中共共同推動，以及當地華人透過馬來亞人民身份致力於進行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結果。馬共既繼承了當地華人社團擔任英國殖民當局基層組織的傳統角色，又為旨在推翻殖民政府的共產主義而鬥爭。

因此，白安娜將南洋革命置於近幾十年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海外華人史及全球史研究的學術脈絡中，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新探索。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有關南洋革命的專書不少出自東南亞地區的出版社，而《南洋革命》由素負盛名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自然得到國際學界更多關注<sup>⑩</sup>。

## 二 《南洋革命》簡介

《南洋革命》分三部分，共八章，每章約三十頁。第一部分「革命在南洋」分三章。在第一章「序言：孫中山的榴槤」中，作者引述中國作家許杰發表於吉隆坡的文章，該文以氣味濃重的南洋水果榴槤（諧音「流連」），隱喻南洋華人與中國以及與所在地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並暗諷他們依戀南洋社會和缺乏回國效力的理想。在第二章「1920年代分布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關係網：中國革命與被

壓迫民族的解放」中，作者提及孫中山早在清末就在南洋進行政治活動，旨在促進當地華人對中國大陸的忠誠。他在1923年提出與蘇聯結盟的主張；也是在這一年，看重馬來群島在亞太地區戰略地位的共產國際，開始制訂針對印尼的戰略，拉開了南洋共產革命的序幕。第三章「1929至1930年南洋革命和馬來民族：民族、移民、語言」，詳盡敘述了1920年代組建的馬共的起源，指出其成立是由共產國際、中共共同推動，以及當地華人透過馬來亞人民身份致力於進行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結果。

第二部分「1930至1935年共產國際、馬共和海外華人關係網」分二章。第四章「作為混合型共產黨的馬共：1930至1934年的結構、話語和活動」考察了馬共的組織結構、民族話語，認為馬共既繼承了當地華人社團擔任英國殖民當局基層組織的傳統角色，又為旨在推翻殖民政府的共產主義而鬥爭，具有混合、雙重的面相。第五章「1930

至1936年共產國際、馬來亞和海外華人關係網」指出共產國際和中共通過海外華人關係網將馬共與爪哇、新加坡、上海、馬尼拉等地的共產主義革命組織和活動聯繫起來。

第三部分「國民黨、馬共和民族：民族的養成，民族的喪失」分三章。第六章「1928至1940年民族的養成」探討了國民黨在馬來亞推動華僑學校民族主義教育的政策和努力，發現它們無意中促進了共產主義思想在當地出生的華裔青年中的傳播，為馬共提供了大批新幹部和新黨員。第七章「1939至1940年語言、權力和馬共喪失的民族」指出，馬共黨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密切，多屬教育水平較高的當地華人，儘管深受共產國際影響而定義自身為馬來亞「真正的政黨」(real political party)，但影響力仍無法及於當地馬來人和印度人。第八章為「結語」，作者認為「活躍於東南亞的革命性國際組織將居住在該地區的各民族與世界各地聯繫起來。因此，如果不對全球互動有基本的了解，就無法理解當地(無論是新加坡、上海還是馬尼拉)的發展」(頁233)。

### 三 輸入的革命

《南洋革命》詳細勾勒東南亞共運的海外聯繫，這與現下國際學界的全球史研究核心理念非常吻合，即強調從全球視角考察和分析歷史的進程，注重跨民族、跨國家

的往來和聯繫，為歷史敘述提供多維的思路和不同的範式。而且，從2004年孔飛力提出中國現代史和中國移民史交織過程的研究新方向，到2018年陳珮珊探討海外華人如何改變中國大陸的歷史<sup>⑩</sup>，全球史視角的海外華人史一直專注於同文同種的中國人之間的跨國往來和相互影響，《南洋革命》則進而研究海外華人與異族異文的共產國際人員的聯繫，這也是學術上的一個突破。尤其是作者突出了共產國際重視南洋的主要原因：「對共產國際而言，馬來群島處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重要戰略位置，『接近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和印度』。」(頁28)

書中講述的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故事，就是饒有意味的一例。荷蘭人馬林是東來亞洲、輸出革命的第一位共產國際代表。他於1920年主持成立了亞洲第一個共產黨，即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印尼共)，並招攬印尼共產主義領袖陳馬六甲(Tan Malaka)加入該黨，後者成為馬林的合作者和共產國際南洋活動的重要人物。1921至1922年，馬林多次經新加坡往返中國和東南亞，穿梭於上海、莫斯科和荷蘭，在上海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局辦公室，進而推動建立華人社區之間的共產主義關係網；幫助成立了中共，並借鑒爪哇穆斯林民族主義者與印尼共合作的先例，制訂了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即第一次國共合作。馬林也是最早在馬來亞開展共產革命活動的少數幾個人之一(頁8、20、28-29)。

全球史視角的海外華人史一直專注於同文同種的中國人之間的跨國往來和相互影響，《南洋革命》則研究海外華人與異族異文的共產國際人員的聯繫。作者突出了共產國際重視南洋的主要原因：馬來群島處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重要戰略位置。

相比較於其他同一主題的英文學術專著，《南洋革命》特別強調南洋革命的共產國際源頭及其輸入性質，其中對1920至30年代馬共早期歷史的研究是本書最有學術價值的部分，提供了頗多歷史細節。

耐人尋味的是，馬林在印尼、中國、馬來亞三國播下的共產革命火種，只有在非穆斯林社會的華人社區形成了燎原之勢。1930年代馬來亞的華人人數已佔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印尼也集中了大量華人，而且華人在當地經濟中處於優勢地位，儘管組織性較強的穆斯林是社會主流，傳統的華人社會組織相對分散（頁12）。印尼共和馬共裏華人領袖均扮演重要角色：陳馬六甲作為印尼華人，向共產國際建議在廣東成立「爪哇—中國特別委員會」，運用海外華人關係網招徠「政治和經濟上較為重要的中國人口」（頁29）；馬共的成立則依賴楊善集、包惠僧等早期中共黨員（頁8、31）。馬林也是共產國際裏最早提攜毛澤東的人<sup>②</sup>。1960年代毛接過南洋革命的旗幟，成為南洋革命「金主」，遂有馬共重返叢林開展武裝鬥爭<sup>③</sup>、1965年震驚國際的集體屠殺印尼共黨員及當地華人的「九三〇事件」<sup>④</sup>。革命在兩地再次繳羽而歸，更嚴重地禍延了當地華人。

相比較於其他同一主題的英文學術專著，《南洋革命》特別強調南洋革命的共產國際源頭及其輸入性質，大量徵引最新解密的俄國所藏馬共中央決議和報告、共產國際及其在上海的遠東局的指示、馬共與中共的通訊等檔案，其中對1920至30年代馬共早期歷史的研究是本書最有學術價值的部分，提供了頗多歷史細節。中共意識到「馬來半島的共產黨可以在那些尚未成立共產黨的地區建立組織」，因此

積極配合共產國際的南洋計劃，深度參與馬共成立前後的活動（頁50-51）。但這種做法引發了當地黨員的批評：「有見於馬來亞黨在制度上從屬於中國黨的錯誤，部分黨員堅持組織一個團結全馬人民的政黨。」（頁55）從這些前蘇聯檔案中的記錄可見，中共之於馬共擁有較大影響力，也導致其後馬共難以擺脫華人政黨的形象。

此前對馬共早期歷史的研究，以楊進發的《馬來亞共產主義的起源》最為全面。楊著主要依據中文和英文的史料，加上對曾經參加過馬共革命活動的一些親歷者的訪談，深入研究了二十世紀初期到1930年代中期馬共發軔到成形的過程。楊著無疑是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但它缺乏俄國所藏有關馬共的一些重要原始資料。《南洋革命》引用楊著三十多處，再透過共產國際檔案加以佐證，如引述楊著指出馬共成立時的核心成員是一批來自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的海南青年（頁51），並刊出共產國際所藏曾任南洋臨委書記的海南青年楊善集的珍貴照片作為補充（頁31）；又補充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胡志明、傅大慶等人對馬共成立工作的參與（頁52-53）。

引人注目的是，《南洋革命》發現了俄藏共產國際檔案裏的一份關於馬來亞共產革命的報告（編號為RGASPI 534/3/549/25-27，日期為1930年11月18日），考定為出自越南共產黨創始人胡志明之手，並披露了諸多報告內容，為胡對馬共早期發展的深度參與提供了更多歷史

細節。胡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可上溯到他早年作為外來勞工在歐洲從事共產主義革命活動時期，1920年代胡在中國曾經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 (Mikhail Borodin) 的秘書。他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派往主持馬共成立大會的兩位特使之一 (頁 51)，並曾長期幫助、監督馬共工作。因為共產國際直到 1935 年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也不承認馬共為支部 (頁 141)，馬共需要通過胡向共產國際申請活動經費補貼 (頁 148)。胡也運用他的地位來排除和平衡中共對南洋共產革命的影響，在馬共成立之前先在共產國際管轄下建立印度支那共產黨，並試圖在安南、暹羅和印度支那領導共產主義組織 (頁 52)。

#### 四 若干不足

除了新史料的披露，《南洋革命》在理論分析上主要的新意是綜合之前王愛華、諾尼尼 (Donald Nonini)、陳綠漪、孔飛力及班國瑞 (Gregor Benton) 等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sup>15</sup>，將馬來民族的發明置於 1920 和 30 年代東南亞新興民族主義、海外華人關係網和共產國際相互作用的全球背景下進行分析。論述的一個中心概念是中文詞語「民族」。在章節標題和正文裏，作者都使用漢語拼音“minzu”而沒有使用對應的英文專詞，因為在馬共話語中，「民族」一詞具有多重含義，表示為「民族」(nation)、「國籍」(nationality)、「人民」(people)

和「國民」(national)。「民族」含義游離不定，時間不同、受眾不同，甚至受眾相同而時間相異都會有不同的含義 (頁 8-9)。作者認為，馬共話語中的「馬來民族」是作為新的國家願景的一部分而發明出來的，是一個輸入的概念，而不是作為一種傳統的延續。「馬來民族」確乎是發明出來的，而且正如作者指出，實際上是海外華人知識份子為當地華人社區想像出來的 (頁 13-14)。不過，說它不是作為一種傳統的延續，似乎尚有商榷的餘地。馬共話語固然有從共產國際那裏學來的一套，但同樣不可忽視當地的傳統。

十九世紀馬來亞、印尼等地先後發現的錫礦和建立的橡膠、蔗糖種植園，刺激了對勞工的大量需求，吸引了大量外來勞工，包括華人移民。十九世紀初在印尼的華人就有十萬。從 1882 到 1932 年半個世紀的大部分年份裏，每年遷徙到馬來亞的華人都超過十萬<sup>16</sup>。父親出生在馬來亞的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其論說民族主義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中，就曾上溯過馬共成立之前「馬來人」共同體的發軔。在華人大量移居馬來亞期間，當地的社會有了長足的發展，通過殖民當局在人口調查中「馬來人」的獨立分類建構、行政管轄的地理分離界線，以及貴族學校裏當地蘇丹子弟的集體活動等，「馬來人」這一「想像的共同體」已隱然形成<sup>17</sup>。

作者認為，馬共話語中的「馬來民族」是作為新的國家願景的一部分而發明出來的，是一個輸入的概念。不過，說它不是作為一種傳統的延續，似乎尚有商榷的餘地，同樣不可忽視當地的傳統。

作者將「南洋」定義為「大致相當於當代英文語義中的東南亞的華人移居地區」，而在1930年代之前的共產國際文獻中，「南洋」指包括馬來群島、馬來諸國或者印尼。印尼的共產革命與馬來亞幾乎同源同步，談到南洋革命實難以忽略印尼共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南洋革命》的書名表明，本書主題是對1890至1957年這一時期在南洋地區的革命運動的歷史考察，作者的用意是要在時間上涵括孫中山在南洋的革命組織和活動（1890年）與馬來西亞獨立建國（1957年），地理上涵括馬來亞、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各國。然而綜觀全書，雖然也有述及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地華人組成的共產黨，甚至是美國的華人共產黨，但本書的絕大多數內容時間上都集中在1920和30年代，地理上偏於馬來亞一隅。作者將「南洋」定義為「大致相當於當代英文語義中的東南亞的華人移居地區」（頁xiii），而在1930年代之前的共產國際文獻中，「南洋」一詞指包括馬來群島、馬來諸國（包括泰國、緬甸）或者印尼（頁57-58），與中文語境的「南洋」相近。印尼的共產革命與馬來亞幾乎同源同步，難捨難分，談到南洋革命實難以忽略印尼共的發展。由此可見，《南洋革命》的書名略有名實不符之嫌，至少在敘述上欠缺平衡。至於書名的時間下限1957年，是馬來西亞獨立建國的年份，卻不是南洋革命的結束。此前有將馬共非法化的1948年《緊急狀態法案》之發布、有1955年馬來亞政府和馬共的華玲和談，此後有1960年代初馬共開展武裝鬥爭、有1965年「九三〇事件」，南洋革命尚未到窮途末路。時間下限劃在1957年，令讀者有戛然而止之感。

此外，《南洋革命》比較強調共產國際對南洋地區的革命運動的影

響，而對於馬來亞歷史上第一個合法化政黨國民黨的影響力就不甚了解，這也是目前許多英文研究忽略的，包括本書多所參考的班國瑞、孔飛力等著名的西方學者。例如，本書雖然探討了1928至1940年國民黨在馬來亞推動民族主義活動，也提到在中國出生的馬共成員將馬共作為中共的籌款渠道（但金額甚微，如馬共曾給上海的共產國際寫信說，馬共籌集了1,000美元，用於支持中國蘇維埃革命，頁149），不過甚少提及當地華人長期作為國民黨重要「金庫」的重大史事，這是本書的一個缺憾。比如抗日戰爭中，華僑捐款幾乎佔國民政府全部軍費的三分之一，其中1937至1940年間，華僑捐款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來自馬來亞華人。而馬來亞華人只有170多萬人，僅是國民黨在戰時中國統治區幾億人口的零頭，但財經上之於國民黨政權的重要性卻堪比1937年全面戰爭爆發前的上海<sup>⑩</sup>。這是國民黨在南洋推動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背景和動機，也是國民黨受到英國殖民當局以及當地穆斯林組織防範杯葛的一個原因。箇中諸多歷史因緣，尚待進一步考察解釋。

## 五 小結

本世紀以來，全球化從高歌猛進到近年呈現某些分化瓦解的下行趨勢，刺激了國際學界全球史研究方向的推陳出新，尤其各地與全球的互動，熱點在諸如戰爭、資

本、商業、貿易、科技、教育等方面。如今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史與地方》(*The Global in the Local: A Century of War,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sup>①</sup>，是對全球史研究進行修正的最新嘗試，論證的要點在戰爭、商業和科技，但沒有談到革命與地方問題。而《南洋革命》別開生面於非物質的、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共產革命，利用共產國際這一歷史主角的原始資料，從全球史的視角對1920至30年代以馬來亞當地華人為主體的馬共歷史進行了深入的再考察，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全球史的多重面相，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革命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一本很有意義的著作。

### 註釋

① Chen Jian, "China and the Cold War after Mao",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3, ed.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 Westa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87.

② 〈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主要問題——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紀要〉(1949年2月3日)，載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中蘇關係》，第一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頁409。

③ Anna Belogurova, "A Durian for Sun Yatsen: Interwar Communism in British Malaya, 1926-1942"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2).

④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Cheah Boon Kheng, *The Masked Comrades: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 1945-48*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79);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46*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⑤ Gene Z. Hanrahan,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71); Anthony Short, *In Pursuit of Mountain Rats: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Singapore: Cultured Lotus, 2000).

⑥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as told to Ian Ward and Norma Mirafior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 陳平口述，沃德(Ian Ward)、米拉佛洛爾(Norma Mirafior)著，方山等譯：《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2004)。

⑦ Leo Suryadinata, e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Fujio Hara,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南洋革命》別開生面於非物質的、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共產革命，從全球史的視角對馬共歷史進行了深入的再考察，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全球史的多重面相，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革命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⑧ 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132.

⑨ Adam McKeown, *Melancholy Order: Asian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ord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deline Y.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How the Yellow Peril Became the Model Mino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⑩ 目前已有數篇發表於英文學術期刊的書評，例如 David Kenley, “The Nanyang Revolution: The Comintern and Chines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1890-1957”,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51, no. 2 (2020): 347-48; Zhu Qian, “Anna Belogurova (2019), The Nanyang Revolution: The Comintern and Chines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1890-1957”, *China & Asia: A Journal in Historical Studies* 2, no. 2 (2021): 339-42。

⑪ Philip A. Kuhn, “Why China Historians Should Stud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Vice-versa”,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 no. 2 (2006): 163-72;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1.

⑫ 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著，卿文輝、崔海智、周益躍譯：《毛澤東傳》，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173。

⑬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437, 457-59, 466-69, 499.

⑭ 「九三〇事件」前夕的1965年8月5日，印尼共總書記艾地(Dipa N. Aidit)到北京會晤毛澤東。從現下已披露的談話紀要來看，毛事先對艾地的軍事奪權計劃知情，但不是主謀。該計劃的失敗引

發針對印尼共及華人的屠殺。參見 Taomo Zhou, *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9-10。

⑮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Liok Ee Tan,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hilip A. 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Gregor Benton, *Chinese Migrants and Internationalism: Forgotten Histories, 1917-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7).

⑯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62, 148.

⑰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161、253-54。

⑱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台北：國史館，1997)，頁414；楊建成：《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的理論與實踐，1924-1991》(台北：楊氏台灣現代史資料出版屋，2001)，頁57、70。

⑲ Xin Zhang, *The Global in the Local: A Century of War,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梁加農 加拿大聯邦政府就業和社會發展部諮詢工程師，原中國浙江絲綢工學院絲綢史研究室副主任。